

论宋教仁政治思想的多重矛盾

曾长秋, 高科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宋教仁政治思想表现为理性思考与实干精神、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政治理想与现实策略之间的矛盾统一。其政治思想的多重矛盾, 皆渊源于地域文化、知识结构、时代潮流和自我认知的差异。对其多重矛盾的政治思想, 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宋教仁; 政治思想; 多重矛盾

中图分类号: K25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6-0135-06

从宋教仁被刺至今百余年间, 对其人其政治思想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褒者称其是“为宪政流血第一人”“杰出的革命家”“优秀的政治活动家”“理性的爱国者”; 贬者斥其为分裂革命的“革命党中第一个罪人”“妥协派”“议会迷”。截然相反的评价, 固然有其深厚的根源, 即复杂的时局背景、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清末民初多变的政治走向和后来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其本身复杂矛盾的性格和政治思想, 也是导致对其不同评价的重要原因。纵观其一生, 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其政治思想存在理性思考与实干精神、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政治理想与现实策略等多重矛盾。深入分析其政治思想多重矛盾的表现, 探究其政治思想多重矛盾的渊源, 有助于解析其一些颇具争议的行为, 也有助于理解世人对其所作的复杂而矛盾的评价, 更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其政治思想。

一、宋教仁政治思想多重矛盾的表现

(一) 理性思考与实干精神的矛盾统一

宋教仁书生革命, 敏学乐思, 理论先导是他本能的路径依赖。1906年9月,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不要急于求成, 须以“谨慎镇静”的心态“谋天下事”, “对于个人, 则谋预备其真本事”。^{[1](817)}1908年11月, 他在一次谈话中认为, 革命者应沉下心来, 努力地学习和研究“有关政治的书籍”。他认为, 革命党

要在中国北方起事, 就必须研究那里的情况。为此, 他与人秘密去北方旅行, 通过了解情况筹划边地革命。^{[1](69-70)}实践应以理论作指导, 理论先导这一本能, 在他形成中部革命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记载, 至少在1902年夏, 他尚在家乡桃源县漳江书院读书时便萌生了以武昌为中心的中部革命思想。1906年, 他在研究世界革命时, 尝试将革命方式分为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两类。次年他赴东北运动“马贼”, 开展边地革命。此边地指中国东北, 而不是孙中山等人关注的东南沿海或西南边陲。1910年, 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 即中央革命、边地革命与中部革命。在边地革命多次失败之后, 他研究了葡萄牙等国的革命模式, 认为边地革命可能导致列强干涉和国家分裂。至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 孙中山主张的南方“边地革命”无以为继, 在首都发动“中央革命”被论证为“运动较难”。于是, 宋教仁才组织中部同盟会开展长江中游“中部革命”的实践。开展中部革命较迟, 虽有孙中山倾向于边地革命的缘故, 也与他谨慎行事、需要进行理性思考和论证有关。

宋教仁从1904年起, 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 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实干精神。1904年12月13日, 他逃亡到东京, 1905年1月2日, 尽管他毫无办报经验, 仍与张步青等人商谈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之事, 不到半年就于6月24日出版发行了第一期。1905年11月, 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留日学生发起反取缔规则运动, 他的好友陈天华行为激进, 为抗议日本政府并激励同胞, 于12月8日蹈海自

收稿日期: 2015-04-03; 修回日期: 2015-06-12

作者简介: 曾长秋(1950-), 男, 湖南浏阳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高科(1973-), 男, 湖南常德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共常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杀。事前宋教仁并不支持,事后却成为留日学生抗议运动的牵头人物。还有一些事情,他没有经过充分的理性思考,便果断地行动起来,属于冲动之举。其中,有的事做得相当出色(如办报),开创了中国留日学生跨省办报的先河;有的事做得并不妥当(如反取缔规则运动),他主张全部留学生归国,对革命力量的培植和保护是不利的。

由上可知,宋教仁对革命方略等重大事项,倾向于理性思考(如中部革命思考了9年),所提出的理论也是比较超前和管用的;而对一些具体行动,他则倾向于实干,边干边学,表现得比较急躁和激进。因此,当时的革命党人在钦佩他谋略的同时,往往惊讶于他的蛮干,形成了并不一致的评价。其实,随着他政治经验的丰富,他一直在努力克服“理论先导”的制约和过分理智的本能,在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推动之下,表现得越来越果敢与实干。

(二) 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的矛盾统一

宋教仁对慈禧推行的晚清新政极度失望,认为“期待于九年后实施所谓立宪政之诏敕,亦难保其不变成复古之物”,革命党人必须“自始至终为革命而大声疾呼,从根本上采取革新弊政之手段”^{[1](71)}。他将清末朝廷比作必然会倾覆的危房,并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问题,必须“共谋破坏之”^{[1](580)}“举一国之政治从根本上改弦而更张。”^{[1](386)}在四川保路运动之后,他发现“专制之威非和平所能克,群众之力非压迫所能制”^{[1](375)},于是大声疾呼,自此事以来,国民如果不追求立宪政治则已,如果要追求,“则断非平和手段所能动其毫末”^{[1](376)}。在他看来,清政府极端保守,仿行宪政必然是一场骗局,中国的出路在于激进革命,非根本性的破坏不足以解决问题。他虽不擅长军事斗争,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武力破坏活动,先后参与组织了“万寿节”长沙反清起义、筹划了东北“马贼”起义、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之后,他针对民国政治“不良”进行反思,认为“建设之所由不良,因未能完全破坏”^{[1](531)}。他对武力破坏的功能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认为通过武力破坏而取得政权是政治革新的前提。民国政治“不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武力破坏太多,而是破坏不彻底所致。

宋教仁不仅热衷于以武力破坏获取政权,而且对破坏后的建设问题超前关注。《宋教仁日记》记载,1906年初至1907年初,他在完成学校课程之外,购买并阅读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的书籍,还翻译了其中的11部,由此成为同盟会中最具近代政治法律意识的人之一。1911年4月,他暂时放下《民立报》的宣传工作,赴香港、广东参加黄花岗起义,并起草了3册

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等文件,以备起义成功后建设新政府所需。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与黄兴等赶赴武昌,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政务省官职令》等8个文件。民国初年,相对于其他同盟会成员,他十分自然地实现了由革命者向建设者的华丽转身。他说,“当革命之时,我同盟会诸同志所竭尽心力,为国家破坏者,希望建设之改良也”,强调同盟会对国家建设“抱极重要之责任,盖断无破坏之后即放任而不过问之理”。^{[1](554)}他指出,同盟会以前从事革命斗争的目的在于“推翻不良之政府”,辛亥革命之后如果没有“建成良政治”,革命算不上完全成功。然而,袁世凯政府仍然“政治纷扰”“政治污秽”,以这样的政府要想建设“良善之政治”是不可能也是无希望的。国民党今后的责任,在于精选“一木一石、一椽一栋”,筑牢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1](579-580)}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武力破坏的成功,在“良政治”还没有建成之前,已事破坏的革命者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上可知,宋教仁不是为破坏而革命,而是为建设而革命,只有建成了“良政治”,破坏才有价值,革命才实现了真正的、完全的成功。在同盟会的领导层和骨干中,既从事武力破坏,又思考破坏之后“良政治”应该如何建设问题的,除了孙中山和宋教仁之外,并不多见。在革命期间就做了建设之准备,此举导致当时绝大多数同盟会成员不理解宋教仁的行为,认为他革命不专心,待武力破坏成功之后才恍然大悟,认可了他的眼光和他建设思想的价值。

(三) 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的矛盾统一

宋教仁作为“万寿节”长沙起义未遂、流亡日本的清政府通缉犯,与清政府势不两立。斗争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暴力革命,另一类是舆论宣传,其中最令清政府胆寒的是舆论宣传。他先后创办、主编、撰述《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民报》《民立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文章,成为颇具盛名的明星报人。

宋教仁在反清的同时确有助清之举,此举主要在对外交涉领域。1907年,当他赴东北联络“马贼”、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时,无意中发现日本伪造“间岛”主权的证据,企图侵占延吉。他暂时中止革命活动,化装成日本人打入日本间谍组织长白山会,获取了日方伪造的大量证据,并拍成照片,然后回日本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历时6个月写成6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专著。该书以国际法为出发点、以日韩资料为基本证据,确凿地论证了间岛为中国领土。他写成之后,

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将书稿送到国内, 对清政府在中日交涉中最终能够维护间岛主权有一定的帮助。延吉是满族的“龙兴之地”, 东三省为满族地盘, 汉人不能在此定居。作为一位知名的反清斗士, 帮助满人保住延吉, 当时受到很多同盟会成员的猜疑和误解。为此, 他在新加坡报刊公开了写给李家驹的信件, 表明自己“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 但考虑到这些政府官吏昏聩无知, 可能坐使日本人攫取中国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国民应当人人珍惜。“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 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 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 则尤不宜袖手含默。”^{[1](67)}其实, 除了间岛问题之外, 他还公开发表了《滇西之祸源篇》等9篇边疆史地论文, 对清政府的外交有所帮助。可见, 他虽然认为清政府无能, 但在被推翻前还暂时是国家的代理人, 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他不得不向它输送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

由上可知, 宋教仁在维护主权方面, 时常处于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的矛盾冲突之中。在面对列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巧取豪夺时, 他表现得相当理智和清醒, 在坚守自己政治立场的前提下, 也对清政府实施了外交援助。在他看来, 自己实际上帮助的不是清政府, 而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的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看似矛盾, 实质上却统一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中。

(四) 政治理想与现实策略的矛盾统一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包括民主宪政思想、责任内阁思想、政党政治思想等内容, 其中民主宪政思想是最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清政府不让国民丝毫参与立宪, 其立宪是虚伪的, 不过是“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1](309)}, 同时认为日本号称立宪30多年, 仍然不能摆脱少数人垄断专制的习气, 其立宪是“非立宪的”, 最多只能算“半立宪国”。^{[1](363-365)}出于对清政府真专制、假立宪的反感, 他认为民主宪政的目的在于保证民权, 并指出, “国家有政治之主体, 有政治之作用, 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 运用政治之作用, 此共和之真谛也。”^{[1](547)}为了保证国民的政治主体作用, 除了有一部形式上的宪法之外, 还应有议会与政党来提供“运用政治之作用”的载体。他认为当今世界的民主共和国家, 政治的权威不是集中于政府, 而是集中于议会。议会与政府都是凭借法律执行“正式有效之器械”, 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事实上之政党”, 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家可以说是“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 也可以说是“实际左右统治权力之机关”。^{[1](497)}他一直坚持“总统当为不負責任, 内阁制之精神,

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1](555)}。他希望国民党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的最大党, 由此获取政治权威, 进而组织纯粹的、有责任能力的政党内阁政府。他认为, 国民党只要在国会里获得了半数以上的议席, 便可以成为执政党, 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 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贯彻了。他由此得出结论: “夫立宪之根本, 孰有大于宪法者? 立宪之精神, 孰有大于立宪机关之作用及责任政府之组织者?”^{[1](306)}他的政治理想落脚于政党内阁制, 认为政党内阁制是民主宪政的核心, 舍弃政党内阁制便可能坠入专制, 失去“立宪之精神”。

清末民初, 中国最大的现实是列强环伺、国弱民孱, 亟需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革命党人仍然无法掌控优势的政治资源, 被迫将政权分享于立宪人士, 或让渡于北洋势力。在这种情况下, 革命党除了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之外, 没有任何途径和可能重新掌控政权。宋教仁对此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 他努力运用各种西方现代政治营销之术整合政治资源, 化解政治危机, 争取政治优势, 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进行选择与衡平。他纵横捭阖, 虽然一跃而成为民初活跃于前台的政治明星, 但无论他怎样注重技巧与策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他的政治理想一再碰壁, 每每陷入窘境。在民国政权未让渡于北洋势力之前, 他力主设置总理职务, 实行政党内阁制。而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 临时政府的政令不出南京, 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的稳定是当务之急, 孙中山主张的总统制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支持。在各省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总统制、不设置总理以后, 宋教仁暗渡陈仓, 试图通过立法在总统制中渗入一些内阁制的因素。各省代表会议出于对他“运动总理”的警惕, 不但取消了他关于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动议, 甚至他任内务总长一职的提名也被否决。后来, 孙中山依约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北洋势力即将接管政权, 出于对袁世凯专制的恐慌和防范, 革命党人这才认可他的政治智慧与先见之明, 通过立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虽然他一直力主的内阁制终被确立, 但此时到来的内阁制并非他所期待的时机。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在理想重挫之下选择了隐退, 而他却毅然选择了合法斗争的策略, 希冀通过组织政党内阁这一途径使革命党人再次掌握政权。1912年8月, 他以同盟会为核心, 以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为“采用民生政策”做交换条件, 联合统一共和党等5党成立了国民党, 搭建了与袁世凯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的平台。1913年初, 在民国首届国会选举中, 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宋教仁的成功, 构成了对袁

世凯权力的直接威胁,便派人将他暗杀于上海,由此切断了国民党重获政权之路。他所力主的政党内阁制,亦未在中国政坛真正实行。

由上可见,宋教仁并非纯粹的政客,他有道德操守,有政治理想,有奋斗精神,在民初原始、浮躁、阴暗的政坛中显得十分抢眼和另类。他虽是书生革命,却很少书生意气,能用理想的目标指引方法的运用,用策略的方法推进目标的实现,其理想与策略的巧妙合用,在中国掀起一股“宋氏旋风”。此种复杂而矛盾的政治表现,使他百年来始终具有一种悲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形象。

二、宋教仁政治思想多重矛盾的渊源

(一) 理性思考与实干精神的矛盾源于其成长的地域文化

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南下的中原文化使湖南成为正统的儒学区域,并与湖湘本土文化传统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形态。传统儒学虽然讲求义理、事功,但后世的程朱理学则过于强调内心反省,湖湘文化则重新提出既要讲求性理,也要讲求实际。亦如湖湘文化集大成者王船山所言:“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可见湖湘文化的知行观是统一的,既追求“大本大源”又讲求“经世致用”,而追求“大本大源”需要“真知”,讲求“经世致用”则需要“力行”,从而使得湖南人既重理性思考又具实干精神。后来王船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知行观,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2],这种说法虽然是出于对程朱理学的矫枉过正,客观上却使湖湘文化悄然忽视了对“真知”的同等重视。也就是说,近代湖湘文化的知行观在实行时是存在内在张力的,知行虽然理论上统一,但实际上有所断裂。由于“力行”的重要性得到了相当大的强调,导致湖湘文化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而在陷入重重困境的近代中国,这种特征的有效性又导致了此种特征的进一步彰显,从而使湖湘文化知行观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受其影响,湖南人大多起步于追求“真知”,落脚于“力行”,而最终从“力行”回到“真知”的却不是很多。不少湖南精英人士服膺于离开理论指导、盲目追求实践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便不足为奇了。

宋教仁从6岁至21岁在湖湘文化的腹地——他的家乡湖南省桃源县接受中国传统教育,22岁时又在受湖湘文化影响之地湖北省武昌求学。在风云际会的乱世,一个思想敏锐、求知欲特强的学子,其思想不可

能不受到湖湘文化较深的影响。湖湘文化复杂而矛盾的知行观,使他既注重理性思考,又颇具实干精神,同时也使他起步于“真知”,最终落脚于“力行”。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推动之下,他越来越多地将理性思考锁定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还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从而回归了原本的湖湘文化知行统一观,成为了最终从“力行”再次回到“真知”的少数人。

(二) 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的矛盾源于其特殊的知识结构

清末民初,只接受传统教育的旧式知识分子日渐式微,新知识分子因教育的集中性易形成自觉的群体意识,因教育的开放性扩大了认知空间,因教育的民主性唤醒了自我意识,使这一群体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对社会现实更加敏感,政治参与意识更浓,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的历史责任,成为清末民初革命与建设的中坚力量。宋教仁显然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于1888年入族塾习四书五经,1898年入桃源漳江书院读书,取得了秀才资格。1903年初,他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这是一所与漳江书院完全不同的新式学校,在此接受了外语、数学、理化、法制等新式课程的训练。

1904年,宋教仁流亡日本,在东京学过近半年的兵式操与马术,还先后在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他接受了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波索纳德法学,授课教师是明治期间日本杰出的民本思想家美浓部达吉,讲授共和国体、民主政体、立宪政治、责任内阁、政党议员、人民之权利义务等内容。^[3]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外国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书籍,就连社会主义的知识他也进行了研究,成为当时革命党人中最有学问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他最注重的却不是军事常识,而是关于国家建设的学问。由于武力破坏是政治建设的前提,他一直将武力破坏摆在初步目标的位置,而将政治建设视为终极目标。在从事武力破坏的同时,他超前地做了一些政治建设方面的知识准备。他能够在民初的中国政坛脱颖而出,与他独特的知识结构和长期的知识积累分不开。

(三) 反清与助清的矛盾源于其身处的时代潮流

宋教仁成长于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的双重背景下,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纷纷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把脉开药。他作为一名新知识分子,受影响最深的是民族主义思潮。新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抵御外侮,避免亡国灭种,为民族复兴增添元动力,于是他们往往由国学而西学,由排满而反帝,最终成为

民族主义者, 宋教仁自然而然地遵循了这一轨迹。他的家庭背景也有成为新知识分子的基因, 据《宋氏族谱》记载, 其远祖在明朝嘉靖初年自江西迁来桃源, 由“耕商世其家”而渐成书香门第。令人玩味的是, 宋氏家族虽然“习儒者众”, 但“取功名者少”。祖父宋业鉉就是一个“志洁行芳, 闲静寡言, 与世无城府, 然胸次自分泾渭”的人, 虽然乡试中举, 也“征而不仕”。他的七世伯宋起龙“尤严华夏之辩, 著有《腹笥草》诗集, 深寓反清复明之旨”。宋教仁对这一诗集极为推崇, 在日记里4次提及。他的胞兄宋教信“于华夷之辩, 持之尤严”, 曾加入反清复明的会党。^[4]

很显然, 在宋教仁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前, 有一个由家庭背景造成的十分隐晦的“华夷之辩”阶段, 因而具有排满的原动力。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萌发较早, 又得以近距离观察侵略中国最为凶猛的日本, 加上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学说, 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比其他革命党人成熟一些, 早在留日初期便突破了古老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民族”观, 演进为近代意义上的、把“中国”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中华民族”意识观。^[5]所以, 他坚持排满反清, 其根本目的是反帝御外, 当排满反清与反帝御外发生冲突时, 便自觉地将反帝御外摆在优先位置, 为了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 甚至可以暂时与清政府合作。

(四)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源于其复杂的自我认知

同盟会虽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联合而成, 但三会从未真正实现整合, 从成立之日起, 派系斗争不止, 孙中山也从未实现对同盟会有效的控制。宋教仁革命生涯起步于以黄兴为领导人的华兴会, 故在同盟会内始终与黄兴结盟。他对黄兴的尊重更多缘于年龄差距、乡土观念和品德信赖, 未形成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至于对孙中山, 他经历了一个由景仰到抱怨的过程。1907年, 他在日记中批评孙中山平时不能“开诚布公, 虚心坦怀以待人”, 行事接近于“专制跋扈”, 使同盟会“自成立以来, 会员多疑心疑德”。他对同盟会“久厌之”, 还认为同盟会“将来之不能有所为, 不如另外早自为计”, ^{[1](937)}萌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1908年11月, 他说中国革命“真正的大首领”尚未出现, 像孙中山那样的“野心家”做同盟会的领导人, 中国革命想要达到预期目的是不可能的。^{[1](69)}综合表明, 至少在1908年以前, 他认为同盟会尚未产生合格的领袖, 自己也不合适做, 只能按“辅臣”的标准进行品德和学识的准备。

宋教仁有湖南人那种“霸蛮”“血诚”的性格, 一旦将民主宪政看作目的, 看作最重要的价值, 便坚韧

不拔地做下去。他认定民主宪政优于专制独裁, 认定两党竞选、责任内阁制是好的政治制度, 极其希望中国走上这条“良政治”的道路, 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为此, 他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力主政党内阁制、“运动总理”、成立国民党、致力于议会选举。后来, 他虽然仍奉孙中山为领袖, 但自身的独立性愈来愈强, 他对自己在革命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做了调整, 即弱势领袖的强势“辅臣”。这一矛盾性的自我认知, 使他不断强化自己的历史责任, 不断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 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 从而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他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三、对宋教仁政治思想多重矛盾的评价

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 或者说先驱者必孤独。革命要成功, 政治要发展, 社会要进步, 都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他在短暂生命期间的一切努力, 包括他的死, 都对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 用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两党轮替来治理国家, 这个思路有点超前。但是, 他将理性思考与实干精神统一于革命形势, 将武力破坏与政治建设统一于“良政治”, 将反清斗争与助清之举统一于爱国主义, 将政治理想与现实策略统一于制度建设, 较好地实现了多重矛盾的统一, 这在清末民初的革命者和政治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因复杂而真实, 因矛盾而深刻, 远远领先于同时期大多数革命者与政治家。超前而激进的见识, 既决定了他能够长期处于“掌握真理”的少数派的位置, 每每被人猜忌和误解, 甚至“盖棺”不能“论定”; 也决定了他不到而立之年便成就伟业, 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国民党的实际缔造者和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虽然他走的这条路看来失败了, 但失败的却是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精英分子),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法治的观念和习惯, 也不习惯于讲民主的行为方式和民主的治国理念。站在今天的角度, 评价宋教仁政治思想在当下的价值,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加以审视。

(一) 存在明显的历史缺陷性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 宋教仁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是客观存在的, 世人对他评价不一甚至截然相反是有渊源的。不可否认, 他多重矛盾的政治思想是因为在他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一是忽视国情, 无力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民初

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旧的权威已倒,新的权威未立,国家趋于分裂,无以形成一个整体抵御外侮。在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需要的是暂时的集权,而不是分权。宋教仁出于对专制的警惕和防范而力主内阁制,是不大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也是无力回应和解决中国当时最突出问题的。可见,中国不能采取西方式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国家,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二是刻意的政党营销,造成水土不服。民初的中国骤然形成一个看似繁荣的公共领域,宋教仁久居日本和上海租界,误将局部地区公共领域的繁荣判断为全国景象,误将短期的公共领域的繁荣判断为未来趋势,于是采取了很多从西方学来的政党营销技巧和策略,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政坛表现得相当新颖和巧妙,表面上与民初繁荣的公共领域相契合,所以效果一时相当明显。但是,民初公共领域实质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与他的政党营销之术是水土不服的,必然不会长久,而且技巧越多,漏洞越多;策略越灵活,目标越变异。实践证明,他的这些政党营销之术,不仅不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反而使他的政治理想饱受诟病与攻击。当然,他上述两个缺陷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的产物,由此对他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思想产生怀疑,既不科学,也是不客观公正的。

(二) 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性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恪守信念伦理和遵循责任伦理两种衡量政治行为的伦理标准,两种伦理互为补充,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一个能担当“政治使命”的人。宋教仁提出了按西方民主模式比如他基于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民主宪政思想,基于政治协商的政党合作思想,基于国际法和对方不利

证据运用的外交思想,等等,无一不是“显远不显近”,无一不是落实于具体的制度建设,其政治思想和法治路径也因此受到后人的重视与推崇。

当前,人权已写入中国宪法,协商民主已成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法治已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海洋主权已上升为国家安全突出因素。上述重大问题,均可在宋教仁多重矛盾的政治思想中探寻到经验与启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切忌错误地认为“民主宪政”只是西方理论的专利,中国也可以从西方文明中批判吸收“合理内核”,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敢于“拿来”,让“舶来品”换上“中国芯”;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切忌“拿来主义”,简单照搬照抄西方宪政模式,用西方的多党竞选来套用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用西方的宪政标准来要求中国的依法治国,这就必将导致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陷入西方陷阱而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 [1] 郭汉民. 宋教仁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2] 郑焱.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9.
- [3] 冯天瑜. 法政大学留学生与鄂州约法[N]. 人民政协报, 2011-10-10(8).
- [4] 桃源县政协. 宋教仁纪念专辑[Z]. 内部印刷, 1987: 22-30.
- [5] 齐国华. 论“西学”与宋教仁的社会革命观[J]. 史林, 1989(2): 42.

The multi-contradictions of Song Jiaoren's political thoughts

ZENG Changqiu, GAO Ke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ong Jiaoren's political thoughts unify the opposites between rational and pragmatic spirit, force damage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fighting against and help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political ideal and realistic strategy. The multi-contradiction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s originate from the regional culture,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self-awareness. Hence,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multi-contradiction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Song Jiaoren; political thoughts; multi-contradictions

[编辑: 颜关明]